

门外谈兵



李兴斌 著

一家註孫子卷上

計篇

曹操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利卒遠近險易計廟堂也○李奎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一遁甲先

計神加德官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為篇○杜牧曰計者先

將法也於廟堂之先○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

卒○耳○日管子曰先定計而後戰○魯書○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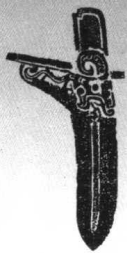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戎○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

安得不先○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

宋本十一家注孫子

計篇

社書魯齊



门外谈兵

李兴斌 著

兵心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门外谈兵/李兴斌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4. 1

ISBN 7-5333-1263-5

I. 门… II. 李… III. 军事史-研究-中国-古代-
文集 IV. E 2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4772 号

门外谈兵

李兴斌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276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263-5/K·371

定 价 20.00 元



序一

刘蔚华

本书的作者李兴斌同志是一位自学成才的长于研究古代兵法的学者。他因为参军比较早，又赶上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没有能够适时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然而他始终没有放弃治学的心愿。他在部队本来是从事军医工作的，但在认真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同时，他潜心攻读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著作，其中当然包括那些著名的军事著作。这期间，他对毛主席指挥革命将士进行的震惊世界的众多宏大战役的军事艺术，产生了由衷的钦佩和敬仰之情。很显然，这为他后来专心致志地研究中国古代兵法打下了坚实的军事理论



和知识基础。

兴斌同志从部队转业后，先是在一家医院工作，1987年调入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从事行政工作。他的工作作风可以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来形容。他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清水衙门”般的学术社团来工作，是和他有志于学术事业的初衷分不开的。他利用工作之便，和学术界的许多知名学者广交朋友，虚心求教，按照自己的爱好，陆续撰写与发表了一些研究兵法和古代军事史的论文，并获得了副研究员的专业职称，后来还担任了山东省社科联学会部副部长职务。1992年，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创办了一个内部学术刊物《孙子学刊》，先后发行了17期。由于学术界和社会上“兵法热”的兴起，使这个国内惟一的以研究和弘扬兵家文化为旨趣的内部学术刊物备受学者和广大读者的重视，直到国内削减和整顿内部刊物而休刊时，竟至于欲罢不能。

在创办《孙子学刊》期间，兴斌同志对兵法的研究趋于深化，收入本书的一些论文，多属于他在此期间的创获。我本人当时是山东省社科联的主席，同时兼任《孙子学刊》的主编。我的专业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孙子兵法》也是我的业内之事，我和他在这个领域切磋交流甚多。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曾经为《孙子学刊》升级为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而煞费苦心，因而对于这个刊物最终休刊的命运都深感惋惜！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的一部伟大的军事与哲学经典，两千五百多年前，在齐鲁大地上出现了两个圣人，一个是文圣孔子，另一个是武圣孙子，而《论语》和《孙子兵法》是同时代出现的两部伟大著作，它们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巨大而积极的，其中闪耀的智慧光芒，曾经照亮了古代中国文治武功显赫于世的前进道路。在建设现代化的今日，经过新时代主人正确

地解读和创造性地运用，其光芒将会更加灿烂！

兴斌同志在为人和治学上都是谦虚的。他不肯给自己的论文集取个更亮丽的名字，只说是《门外谈兵》。我想，独具慧眼的读者是自会品评的。依我所见，其中一些见解，尤其是那些“重视谋略、不尚小计”的战略识见，对门内人也是会有启迪意义的。《孙子兵法》所阐发的是“制胜之道”，无论是作战，还是经商，抑或是竞技和股市，甚至包括建设工程等，凡是存在竞争的领域，如果不想落败，首要的问题是科学的决策，而科学决策是必须在战略上首先胜出一筹的。所以，研究兵法而重视谋略可以说是抓住了要害的。当然《孙子兵法》在论述战术方面也是经典的，对此兴斌同志在本书中也多有论列。

从1995年开始，兴斌同志调到了齐鲁书社工作，后来担任了编辑室主任，并在专业职称上晋升为编审。编审是一个教授级的职务，这标志着他在专业方面的成熟，同时也说明他的学术生涯已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自学是可以成才的，兴斌的成长和他这部书的出版就是一个现实的例证。我衷心地祝愿他取得更大的成就。

2003年11月30日于泉城





序二

黄朴民

兴斌兄是我相交多年的挚友，就研究专业而言，是为同行；就人生关系而言，是为兄长。如今，他将自己多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辑汇成集，勒编出版，既是对自己学术探索道路进行认真回顾并作出阶段性的总结，也是进一步深化兵学理论与军事历史研究而惠泽学林的一个贡献，其意义与价值固不待言。作为朋友与学弟，我十分乐意借这个机会，谈谈自己对兴斌兄学术建树的基本认识。

兴斌兄这部文集由三个板块构成：一为“专论”，二为“札记与随笔”，三为“其他”。





这之中，除了“其他”栏目中之《一管笔在手，敢搦孙吴兵斗》专写关汉卿，为中国历史上这位不朽的戏曲艺术大师写出了一份声情并茂、文采斐扬的传记外，全书基本上是围绕军事历史与兵家文化而开掘而展开的，其中尤以《孙子兵法》与三国军事历史为重点。孙子有云：“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是为巧能成事者也。”《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兵学的杰出代表，三国时期的军事斗争艺术是古典军事谋略最生动、最高超的表现形态。兴斌兄选择它们为突破口，恰好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达到了以一统万、纲举目张的目的。这种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的研究视野，实际上为宏观认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本质属性与总体成就提供了一条广阔而平坦的道路。

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兴斌兄也充分做到了不囿成说和匠心独运，从而使得自己的学术观点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众所周知，《孙子兵法》与三国军事历史作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对之感兴趣并予以关注的人不可胜数，相关的研究成果亦可谓汗牛充栋，要别出心裁、自成一说，有着很大的难度。兴斌兄工作的意义，就在于能够依据翔实的史料，经过深入的分析、解读，提出自己独到且言之成理的新观点。自出机杼，新意迭呈，正是这部文集的显著特色。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不断创新，在于不断打破人们习以为常却又实属谬误的成说，这对任何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事实表明，兴斌兄战胜了这个挑战，他的努力和贡献已经为学界所认可。他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其中有许多篇曾受到广泛关注，基本观点先后被《新华文摘》、《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军事科学》、《文汇报》、《文摘报》、《报刊文摘》等转载、介绍或采纳，这可以说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明。





在表述方式上，兴斌兄十分注意语言的平民化和文本的生动化，尽量放下学术论著貌似高深的“贵族”架子，努力消弭研究者与一般受众之间的畛域，用亲切自然的方式叙述自己独到而深刻的学术见解，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从而感化挹注，激发尽可能多的人对兵家文化和军事历史产生兴趣。这一表述方式上的特点，不但反映在“专论”部分，而且更充分体现在“札记与随笔”部分。我个人认为，兴斌兄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其意义应当被特别予以强调。我们知道，军事历史研究长期遭到冷落，这除了整个社会日益被功利心态和氛围所浸淫所充斥的因素外，也与军事历史研究在表述上观念陈旧、形式机械、故作高深有直接关系，用王晓毅教授的话说，便是“仅仅用军事科学和史学考据进行理性分析”，“陷入术语的堆砌而枯燥无味”，结果自然是“难以为广大读者认可”。所以，兴斌兄所力行的这种健康朴实的学风和文风，值得在包括军事史研究在内的整个史学研究领域发扬光大。

兴斌兄在军事史研究方面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绝不是偶然的。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情况稍有不同，军事史研究能否有所建树，更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素质与条件。因为军事谋略和战争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运用者、研究者自己的独到体悟。换言之，军事史研究水平的高下，往往与研究者的本人的人生阅历息息相关，而兴斌兄恰好具备了这方面的综合条件：军旅生涯的直接体验，社科管理的丰富阅历，编辑业务的特殊环境，再加上业余研究的无拘无束、全凭兴趣使然，以及他的勤奋与执著，使得他能够真正从深层次上感悟到中国军事谋略文化的奥秘与魅力，这是那些经历苍白的研究者所无法相比的。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中。”以此理解兴斌兄在中国军事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实在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作为兴斌兄的一名挚友，我真诚地祝贺他的这部文集的出版，并为此而感到骄傲；同时，我也真诚地希望他能够在军事史研究领域继续努力、再创佳绩，并以此与之相互勉励。

2003年4月28日于京华厢红旗





目录

- 1 序一/刘蔚华
- 1 序二/黄朴民
- 专论·
- 1 “重义轻利”价值观评析
- 15 《孙子》精髓新解
- 19 《孙子》伐谋思想简论
- 35 《孙子兵法》对中国古代
军事谋略学的构建
- 63 《孙子》歧见八例辨析
- 72 项羽败亡的军事地理原因
- 82 论韩信的用兵艺术
- 98 关于“李广难封”的几个问题
- 106 《〈隆中对〉别论》质疑
- 117 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时间再认识



- 126 刘备借荆州考析
137 诸葛亮北伐曹魏目的论析
151 诸葛亮北伐何以不用魏延的奇谋
160 重评曹操的军事才能

·札记与随笔·

- 177 关于“曹刿论战”的别一番思考
179 关于“兵书热”的思考
183 谈古论今话《孙子》
190 三国英雄与《孙子兵法》
194 背时的汉献帝
196 漫话吕布之贱
198 马谡之死辨疑
204 自取其祸 何怨之有
208 韩世忠何以能得善终

·其他·

- 214 《孙子兵法新译》前言
220 《孙臆兵法新译》前言
228 一管笔在手，敢搦孙吴兵斗

·附录·

- 328 三国鼎立局面形成问题研究综述/景有泉
337 后记/李兴斌





·专论·

专论·「重义轻利」价值观评析

“重义轻利”价值观评析

我国向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重视对高尚道德和完美精神的追求。而“重义轻利”，则是传统精神中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舍生取义”、“见得思义”、“多行不义必自毙”等名言警句，几千年来一直被用以褒贬劝戒。然而，在前些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人“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盲目贬低民族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不加分析地将“重义轻利”看做是封建、陈旧、过时的价值观念而予以否定，以至于“颂利非义之声盈耳，弃义逐利之行盈目”，助长了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因此，认真考察和分析这一传统的价值观，指出其合理性与科学性内涵，发掘其中的精华，对于振兴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其他各家文化凝聚、塑造而成的。事实上，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也的确主要源于儒家思想。因此，这里将着重对儒家的义利观作简要考察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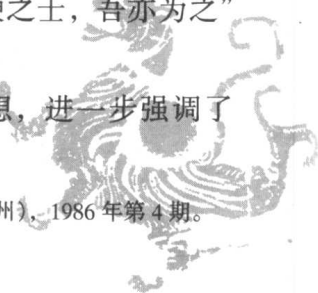
—

论者一般认为，重“义”轻“利”，把“义”与“利”对立起来，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特征^①。其实，这一观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并不符合实际，它包含着对传统义利观的许多误解。我认为，传统义利观的确重“义”，但却并不一般地排斥“利”，更未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其所轻之“利”，是有特定含义的，并非如某些论者的理解。

第一，在现实生活中，传统义利观肯定、关心人的感性欲求和正当利益。

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是重“义”的。他主张“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下引诸子均只注篇名）、“义以为上”（《阳货》），倡导人们“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他甚至提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但在同时，孔子也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他本人不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乡党》），而且明确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重“义”的思想，进一步强调了





“义”的价值。他把“义”看得比生命还可贵，主张在“生”与“义”不可兼得时要“舍生而取义”（《告子上》）。但孟子和孔子一样，也肯定了人的食色之欲、求生之欲和求富之欲的正当性。他认为，“富”、“贵”、与“好色”，都是“人之所欲”（《万章上》）。他自己就曾明确地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告子上》）

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更反对“去欲”、“寡欲”。他认为“人生而有欲”，“虽为天子，欲不可尽”，“虽为守门，欲不可去”，并认为这是“性之具也”（《正名》），“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大略》）。

即使是倡言“去人欲，存天理”的宋明理学家^①，也并非要排除人的一切感性欲求。宋代理学代表人物程氏兄弟就说：“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君子未尝不欲利。”^②在理学家看来，“天理”是指自然的、普遍的规律和大公无私的行为准则。正当的感性欲求，如“饥食，渴饮，冬裘，夏葛”，是“天教我如此”，是自然的，不是自私的，所以是“天理”，必需满足；而“穷口腹之欲”，才属于“人欲”，才应当去之^③。

第二，在为政理民方面，传统义利观强调并重视社会功利和百姓的物质利益。

孔子认为，好的政治是“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圣人之政即是能够给天下人带来物质利益的政治，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不仅符合“仁”的标准，而且达到了“圣”的要求（《雍也》）。在孔子的为政理民思想中，第一位

① 王阳明：《传习录》。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卷十九。

③ 《朱子语类》九六。

的是“富之”，其次才是“教之”：“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孟子同样很重视百姓的物质利益。他主张的王道仁政，主要的是要使民“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认为如此才是“王道之始也”。在孟子看来，如果没有物质利益为基础，民将“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义），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

荀子专门撰写《富国》篇以探讨富国之道。他主张的富国之道，第一是要求统治者“节用裕民”，认为只要如此，就能“有仁义圣良之名”和“富厚丘山之积”；第二是要求统治者“以政裕民”，即区别贵贱长幼，使“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使“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同时“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

第三，传统义利观所说的“轻利”，是指轻不义之利、一己私利和眼前小利，并非轻一切功利。

孔子对待不义之利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此处应为‘去’字）之，不去也。”（《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他反对处处从个人利益出发行事，认为那样会招致过多的怨恨：“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他告诫人们不要贪图眼前小利，而要追求长远大利：“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孔子认为，正当的富贵“如不可求”，就应当从事自己所爱好的事情，即使因此“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也



要能够自得其乐(《述而》)。

孟子也反对将个人的食色之欲和求生之欲看得高于一切。他说：“(纣)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纣)则不得食，则将(纣)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纣)则不得妻，则将(纣)之乎？”(《告子下》)在孟子看来，这显然是不行的。他认为，不仅这样的不义之事不可以做，而且当“生”与“义”不可兼得时，还要能够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告子上》)

荀子主张，一个人应当“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不苟》)。他甚至认为，“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王霸》)。

后世儒家各派在具体问题上虽有不同见解，但在反对谋取不义之利方面，却是一致的，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论者常以孟子见梁惠王时说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和汉代大儒董仲舒对江都易王刘非说的“夫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①，作为传统义利观“义”、“利”对立的根据。其实，孟子和董仲舒的话都是有特定背景的，论者断章取义，仅从表面意思下结论，实属对孟、董二人的曲解。战国之时，诸侯间强凌弱，大吞小，相互争战不休，致使田园荒芜，生灵涂炭。对此，孟子深恶痛绝，而魏惠王又是一个不恤民力、穷兵黩武、老朽昏聩、深为孟子看不上眼的国君，所以，孟子才针对其“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问话，毫不客气地予以反诘，意在使其自省，改变那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国家长远利益的做法。董仲舒的话，也是针对春秋战国时各国君主急功近

^①《汉书·董仲舒传》。